

学术与社会视野下的 20 世纪中国史学 ——编书之余的一些反思

罗志田

新的世纪和新的千年即将来临,在此辞旧迎新之际,“回眸”两字在我们的各类言说中出现得相当频繁,全社会似乎都带点怀旧的思绪(与 19 世纪末中国人主要面向未来的倾向大不相同)。久已陷入“危机”的史学因为许多人“历史感”的突然增强而似有枯木逢春的意味,在这样的时刻来回顾和反思 20 世纪的中国史学,真可以说是适逢其时。海峡两岸相关的学术研讨会已开过不少次,《历史研究》杂志开辟了“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回顾”专栏,已刊发了相当数量的论文;而《近代史研究》也推出了“50 年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学术回顾专辑。20 世纪的中国史学的确已经到了应该有所总结的时候了。山东出版总社在此时推出《二十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丛书,其中《史学卷》由我充任“主编”。编辑之余,也有一些体会,下面即结合该书的编辑设想谈谈我对 20 世纪中国史学的一些看法,特别侧重书中所论未及的一些面相和专题。

有好几个原设计的专题目前或尚无人研究,或研究得不够充分,或未联系到学力足以完成该专题的学者,结果都取消了。最后确定的专题是:一、《引论:晚清的政治概念与“新史学”》(王 森撰);二、《民国史学中的新派及其批评者》(王 森撰);三、《二十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蒋大椿撰);四、《学科体制与近代中国史学的建立》(刘龙心撰);五、《中国史学的科学化:专科化与跨学科》(王晴佳撰);六、《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学术编年》(陈力撰)。

依我的理解,这套书虽然试图对20世纪的中国学术进行总结,但不是纯粹的学术史,写作旨趣与过去的史学史不完全相同,更多从社会视角观察,注重学科的发展演化及其与社会的互动。《史学卷》即从整个世纪的发展着眼,注意考察20世纪将结束时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史学状况和对史学的内(史学界)外(社会)认知的相同与不同(即兼顾变与不变的两面),并藉此凸显20世纪史学与前此史学的异同。除了一般史学史中较重视的史学思想之变迁外,也希望关注历史研究的主题、写作和表述方式、所传授的历史知识(如历史课本)、与史学相关的学术建制(institutions),以及社会对史学的认知等方面的变化。

20世纪中国学术有一个重新分类的分化组合过程(一定程度上仍在进行中)。《史学卷》原希望有一专题讨论史学这一学科在本世纪的确立及其发展演变,包括传统史学的延续与中断、新学术典范何时及怎样形成一个达到“约定俗成”(即得到学人共遵)程度的共识、此后史学学科的发展演化等。结果各专题的作者各自从不同的侧面论及这些内容,合全书而共观之,大致可得一个概貌,然专门深入的研究仍待来者。

史学的专科化是20世纪史学的一大特征,在各学科吸收与分化的长程中,史学几乎无所不在,而似乎也快失掉其本身的学科认同,渐呈横看成岭侧成峰的形象。1905年刘师培作《周末学术总序》,“采集诸家之言,依类排列”,所依的类即西学分类,包括心理学史、伦理学史、论理学史、社会学史、宗教学史、政法学史、计学(今日称经济学)史、兵学史、教育学史、理科学史、哲学学史、术数学史、文字学史、工艺学史、法律学史、文章学史等。在这样一种新型的“六经皆史”思路下,专门的“史学”反而不存在了。这一分化的走向在整个世纪都在发展,到世纪末时仍呈增强的趋势。21世纪的人或会问:是否存在不涉及他学科也不分为子学科的“一般史

学”或“总体史学”？如果存在，何在？若不存在，则什么是史学？

专科化的结果自然逐渐导致跨学科的史学。梁启超大概最早注意到其他社会科学对史学的辅助功能，至少是早期最为强调这一倾向者。此后提倡这一取径的史家不少，但成功运用者实不多；真正较大规模而严肃认真地借鉴各社会科学的方法在台湾是从 60 年代后期开始，而大陆则晚到 80 年代了。所以近年大陆史家仍在强调“跨学科的史学”（主要指史学需要各社会科学在方法论上的支持），而台北的杜正胜先生则认为如今史学界对社会科学的依赖和器重已较前减弱得多是史学界的“成熟”。

这里其实牵涉到史学的自主性甚至学科认同的根本问题。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西方史学在研究领域和应用方法上受到各相关社会科学的极大冲击，这导致从狄而泰(Dilthey)、克罗齐到柯林伍德等人对史学自主性的强调，特别指出其与作为社会科学基础的自然科学的不同（这些人关于史学不那么“客观”的言说其实正是基于对史学自主性的深刻关怀）。正是在这样一个西方史学自身处于转型和定位的关键时刻，本身具有多歧性的西方“史学方法”

参见黄进兴《中国近代史学的双重危机：试论‘新史学’的诞生及其所面临的困境》，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1997 年新第 6 期。

我自己就是这些学人中的一个，不过我认为真正跨学科的研究需要跨学科的训练，故主张不具备此类训练者不妨先尝试在史学范围内跨越各专科化的子学科如思想史、社会史、军事史等樊篱，以增强学者视野的开放性。参见罗志田《立足于中国传统的跨世纪开放型新史学》，《四川大学学报》1996 年第 2 期。关于近年大陆学者的主张，参见《史学卷》中王晴佳先生的论述。

杜正胜：《史语所的过去、现在与未来》，“迈向新学术之路：学术史与方法学的省思”研讨会（台北，1998 年 10 月 22-24 日）论文，第 19 页。不过，在同一研讨会上，臧振华先生则提出“社会科学取向的中国考古学”，以区别于“历史取向的考古学”（参见其会议论文《中国考古学的传承和创新》第 19 页）。

开始影响中国。对西方史学缺乏整体了解而又极欲获得新知的中国史家多依据其各人的观念和需要随意摘取西方不同派别的史学方法中大致可以接受的部分(其中又多先有日本人的选择、加工和再创造),糅合入他们所熟悉的治学方法中,而形成各具特色的新史学风格和流派。

史学的专科化和跨学科的史学这两方面在《史学卷》第四、五两编中已较多涉及,而可以更深入探讨者仍尚多。下个世纪的中国史学几乎可以肯定在专科分化和跨学科的路向上走得更远,而史学的自主性也必然引起更多学者特别是大陆学者的注意。有意思的是,克罗齐和柯林伍德是近些年大陆学者引用较多的西方史家(最近几年又较少),但他们面对诸社会科学的冲击而强调史学的自主性这一点从当时到现在都甚少为国人所注意。这最能体现中国学者在引进西方学说时有意无意中的选择性,这一选择性本身及选择的过程和结果或者应是研究西学怎样影响中国史学所当进一步注意的问题。

《史学卷》原设计有一个“西方对中国的研究”专题,拟将20世纪西方的中国研究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其发展演化,特别注重它与同时期西方社会、思想与主流学术研究的关系(比如受德国兰克史学、法国年鉴学派史学,以及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文化批评理论等各方面的影响),希望写出其变与不变的两面。同时尽可能将经典的西方汉学(Sinology)与广义的“中国研究”(Chinese Studies)之间的关联作些考察,如果还能涉及一些西方汉学对中国学者的具体影响就更好。西方汉学和中国研究在当地是相对边缘的学科,对其整体把握首先需要了解西方的主流史学进展。据我

参见李弘祺《泛论近代中国史学的发展与意义》,收其《读史的乐趣》,台北,允晨文化出版公司1991年版,第220-221页。

个人的孤陋见闻,目前尚乏这样的中国学者(只要看看我们各种“西方史学”的选本与欧美大学研究生“史学概论”课程的读物差距有多大即可知);故这一专题原拟请一位西方学者来撰写,曾联系过数位美国学者,皆未能成功,只好放弃。

20 世纪中国“新史学”的一个重要支柱是本世纪初开始逐步引入的西方现代考古学,而其与前此中国旧史学的一个重大区别也就是考古与历史研究的结合。考古学曾给 20 世纪的新史学带来许多希望,甚至出现了挖掘出“更精确、更复杂的‘地下二十四史’”的提法(马衡语);惟因期望值过高也曾带来一度的失望,但考古学确实有力地支撑了 20 世纪的史学大厦。稍觉遗憾的是到 20 世纪后期集考古和文献材料于一体的研究取向越来越少见,这固然因为今日中青年学人的跨学科训练不足,但考古学与历史学的疏离倾向逐渐明显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考古学是否应该独立于历史学已成海峡两岸学人的共同关怀)。无论如何,考古学的总结应该是 20 世纪史学不可缺少的一个部分。但因未请到合适的撰写人士,这一专题也不能不放弃。

《史学卷》的最初设想原来还包括一个从研究取向和方法层面看学术典范的变与不变(兼及流派与代表论著)这样一个专题。这一点我自己其实是有所疑虑的,中国传统本不甚注重抽象出来的“方法”,谦逊一点的说“文无定法”,自信更足者便说“文成法立”。从练武学写字到作文作诗作画,大致都是从临摹入手,在学得像样的基础上再思有所突破,即桐城文派所谓“有所法而后能,有所变

部分即因为“地下二十四史”长期未能出现,以至于专长考古的徐炳昶在 1940 年明确提出疑古的路已经“走到尽头”,现在应“改走信古的路”,以在“传说”中“寻求古代略近的真实”。参徐炳昶《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中国文化服务社 1946 年版,第 14-23 页。1940 年是徐先生署于其第一章“论信古”文后的撰写时间,比该书的实际出版时间要早。

而后大”也。但20世纪初清季学制改革时,已经半被“西化”的发凡起例者都特别注重“方法”;那时的课程设置似乎每一学科都有“研究法”一门课,史学当然也不例外。后来胡适一生以言“方法”而著称于世,梁启超晚年还专门写了《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皆未尝不受从清季开始的“方法热”这一语境的影响。但这一专题也终于没有找到合适的撰者,不过《史学卷》各编多少都涉及此类问题,而既存研究中涉及方法流派者亦多,可以参阅。

我特别感到遗憾的是,与本套丛书的主题“学术与社会”关联最为密切的内容,即史学与社会互动关系,在《史学卷》中没有得到充分的展开,所以我愿意在这里非常简略地讨论一下学术建制与史学研究的关系、与学术相关的新兴社会行为(比如出版发表)、史学表述方式的转变以及史学的社会功能等问题。

如前所述,学术建制与史学研究的关系是《史学卷》特别希望考察的部分。所谓学术建制是广义的,不仅指大学的历史系和各级各类史学研究所等学术机构,而且包括大中小学历史课程的设置及演变、学术刊物特别是史学专业刊物以及专业学会的出现、发展与影响等。这些学术建制基本是20世纪的新生事物,其本身的发展演化及其(作为一个变量)对史学学人与史学研究产生的多方面影响及双方的互动关系,都是大可深入探讨而目前研究尚不足的内容,所幸《史学卷》中第二、四两编已部分论及,但进一步研究的

蒋大椿主编的《史学探渊:中国近代史学理论文编》(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中涉及史学方法者甚众,张岂之主编的《中国近代史学学术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中第二编专论“近代史学方法”,均可参看;并请参阅周予同《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收朱维铮编《周予同经学史学论著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增订本;齐思和《近百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燕京社会科学》第2卷(1949年10月);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上下册,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6、1988年版;胡逢祥、张文建《中国近代史学思潮与流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余地仍甚为宽广。

这些新兴学术建制与 20 世纪新的社会环境和社会条件密切相关,因而也与今日学人爱说的“现代性”颇有关联。换言之,新环境使治学的方式不能不发生变化,办学术机构最力恐怕也最成功的傅斯年指出:历史学“发展到现在,已经不容易由个人作孤立的研究了,他既靠图书馆或学会供给他材料,靠团体为他寻材料,并且须得在一个研究环境中,才能大家互相补其所不能,互相引会,互相订正,于是乎孤立的制作渐渐的难,渐渐的无意谓,集众的工作渐渐的成一切工作的样式了”。其实,中国传统的中央的国子监、翰林院等已大致具备聚集人才相互切磋甚至相互竞争这一社会功能(如曾国藩即到北京进入翰林院后才认识到自己其实“无学”而发愤用功),可以解决“独学无侣则孤陋而寡闻”的缺陷。但正如留学欧洲的寄生虫学家洪式间所说,“各种研究所,均

这方面最新也最详细的研究是陈以爱的《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为中心的探讨》,台北,政治大学史学丛书第 3 种(1999 年)。并请参阅陶英惠《国立北平研究院初探(1929- 1949)》,《近代中国》(台北)第 16 期,1980 年 4 月;张越《国学季刊述评》,《史学史研究》1994 年第 1 期;孙敦恒《清华国学研究院纪事》,《清华汉学研究》第 1 辑,1994 年 11 月;史复洋《燕京学报前四十期述评》,《燕京学报》新 1 期,1995 年 8 月;查时杰《私立燕京大学历史系所初探(1919- 1952)》,《台大历史学报》第 20 期,1996 年 11 月;杜正胜、王森主编《新学术之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纪念文集》上下册,台北,中研院史语所 1998 年版。学科专业学会这一 20 世纪的新生事物大约受西方影响而出现的,与清季人所说所办的政治性“学会”是相当不同的概念。它们在专业人才的聚集、交流和切磋等社会功能方面作用极大(近年则似呈减色之势,非学术的因素渗入渐多),有的学会并创办了渐具权威性的学术刊物,对 20 世纪史学发展演变影响甚大,非常值得研究,惟似尚未见较有水准的论著。

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收其《史料论略及其他》,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49 页。

各有其专门之杂志,以发表其成绩”,这就是传统学术机构所不具备的新功能了。学术机构与专业杂志的互动关系,特别提示了这是一种“现代”的研究机制。

的确,学术建制的影响不仅在于其直接的功能和作用,而且体现在因这些新建制的出现而引发的新兴社会行为。“学术是天下公器”是老话,可当下就要作天下的“公器”;总试图证明什么,总希望说服什么人,却是包括史学在内的20世纪中国学术与传统学术的一大根本区别;而且这一趋向有愈演愈烈之势,西方学界所谓“不发表即走人”(publish or perish)的行为模式已越来越深地影响到中国学界,出版和发表这一社会行为今日对学术和学人的推促和制约决不可小视。所以《史学卷》曾设计有“说服与证明:出版发表与20世纪史学”这样一个专题,希望讨论出版物(包括报纸副刊、综合及专门学术期刊、书籍出版等)及“发表”这一社会行为对史学(及史家)当下的和长远的直接间接影响。

早在1905年,就有国人认为“一国之文明,系于一国之学术;而学术之程度,恒视其著述之多少为差。著述者,其研求学术之结果乎”。到1923年,强烈主张中国应仿效欧美组建各类“研究高深学术”的专门机构的洪式闾在说到各种研究所均有专门杂志以发表其成绩时进而指出,“成绩愈多,则其在学术上之地位愈高。而所谓学术中心之所在,即以发表成绩之多寡定之”。这样的观念当然到很晚才渐成“定论”(其实或仍未定),1925年陈寅恪(时年

洪式闾:《东方学术之将来》,《晨报五周年纪念增刊》,1923年12月1日(附在人民出版社1981年影印本《晨报副刊》第5册),第19页。

卫种:《二十世纪之支那初言》,《二十世纪之支那》(1905年),张、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61页。

洪式闾:《东方学术之将来》,《晨报五周年纪念增刊》,第19页。

36 岁)即全据学识广博的声誉而与其长辈梁启超同居清华国学院的导师之列(他当时似乎只发表过一篇《与妹书》,也无外国学位)。但以著述的数量来衡量学术“程度”的观念似乎得到越来越广泛的赞同,今日仍有力地影响着我们的学术评估体制。

如今的学术机构和学者个人每年都要填报相当数量的表格以“证明”自身的学术成就,惟实际的学术水准是否应以计量的方式来衡量,在学术界又迄今仍未取得充分的共识。今日史学著述从数量上看应是前所未有的繁荣,但学界对这些著述的品质却存在着千差万别的认知(“以量取胜”的倾向产生出一个附带影响,即近年大部头的著述远较前为多,其中不占少数的明显带有“述而不著”的“编书”意味),其中以为未必高明者实不占少数,不少人甚至觉得史学处于“危机”之中。这个问题当然不仅与史学有关,对此的不同见解还会延续到下个世纪,不过了解和认识这一观念的演化进程显然是治学术史者责无旁贷的任务。

出版和发表的社会行为也极大地影响到史学表述即写作方式的转变,这也与对科学的向往有关。张君勱注意到,自科学引入,“国人之著书,先之以定义,继之以沿革,又继之以分类、分章、分节,眉目了然”,认为这才是“科学的”。大体言之,西方传教士最先提供了与今日章节体近似的史学书籍样本,但真正影响中国学人的恐怕主要是从日本人那里传过来的章节体通史,然后才发展到断代史和专门史著作,再后来则逐渐接受今日通行的“学术论文”形式,以具体的专题为内容(近于长篇论文)的著作也日多,到今天则论文和专题著作已成为史学表述最普遍使用的方

张君勱:《再论人生观与科学并答丁在君》,《科学与人生观》,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7 年横排新版(用亚东图书馆本),第 62 页。

式了。这样一种由通向专的发展趋向在《史学卷》的《史学学术编年》中可以清楚看到，但与后来许多学者主张在专题研究的基础上再撰写通论性著作的研究取向几乎完全相反；而其影响则贯穿整个20世纪，近一二十年大陆许多“新兴”的专门史研究仍可见通史领先于专题论著的现象。

其实，今日通行的“学术论文”的形式何时出现？特别是何时为大家所共同接受？也是很值得研究的问题。这又与发表论文的定期或不定期学术刊物的出现和发展直接相关。洪式间所说的依照西方学术分类的专门学术刊物在20世纪的出现其实较晚，从早期的《国粹学报》到北大的《国学季刊》，虽可见越来越走向纯学术化的倾向，惟这类刊物以今日的观念看大致仍属综合性而非专科类期刊。即使在一些专门化的学术期刊出现后，不少研究性的论学文章仍常常刊发在《东方杂志》这一类商业性的综合杂志或者报纸副刊（报纸副刊本身也是出现稍晚的事物）之上，这恐怕部分也因为“学术论文”这一概念的确立较晚。

李弘祺先生认为，传统中国人治学从笔记的短篇记述或考证而逐渐发展出撰写长篇札记的方法，“在清朝时用以治经考史，竟然能演化成为一种简单而实用的归纳法。后来因为合数篇考证而使一些史家能开始作有系统的寻绎历史演变的通则，写成长篇探讨

新的表述方式不一定全是外来的。廖平的《今古学考》应可以说是以特定题目为先导的专题著作，似已开后日“专著”之先河。不过廖著当年流传不广，康有为在廖平著作基础上发展而成的《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则同样为专题著作（一般皆承认康说袭廖，但似未注意康在表述方式上也学廖），而影响广被全国；结合康在万木草堂讲一个一个的专门题目而不是一本一本地讲授经史著作的新讲学方式，康在近代学术史上的地位还要重新定位（梁启超在湖南时务学堂即沿用万木草堂讲学方法，曾引起传统派大哗，而趋新的皮锡瑞则暗学之），这些只能另文讨论了。

制度、风俗、文物的作品”。尤其是赵翼等人的“札记”，其“长处便在于能把论点作有条理的表达与叙述，而其叙述的本身便是举证”，已接近于后来的“学术论文”体。这样的写作方法为晚清以来中国史家所熟悉，因此才能“大致承受得了近代西洋史学之冲击”。从章太炎的《官制索隐》到王国维、罗振玉的古史著述，再到顾颉刚关于古史“层累堆积说”的表述，中国学者进而接受现代西方史学的写作方法，正是“很自然的演变”。

有意思的是，章太炎、刘师培等以经学见长的学人都很看不起赵翼，而比较具有“现代”意识的史家则对其颇多推崇。梁启超指出赵翼长于当时史家之处在能用归纳法作比较研究，“以观盛衰治乱之原”。蒙文通认为赵翼的《廿二史札记》“可说是自成体系的通史，只不过没有把人所共知的史实填充进去而已”。陈垣虽然对学生多讲钱大昕，他自己倒认为“百年史学推瓠北”。金毓黻更盛赞赵氏，以为他意在“总贯群史，得有折衷”，对历朝之“一代大事”，更能“列举多证，娓娓而谈，以明其事之因果嬗变，尤合近代治学之方法”。

金氏所赞赏之“近代治学之方法”，大约即暗含表述其研究成果的写作方式。齐思和认为赵翼治学与乾嘉时代通行的史学方法不一样而“独创一格”，即“创出将正史分成若干小题来研究的方法”。这应该已接近后来“论文”的形式了，故李弘祺的说法大致可成立。20 世纪中国最早的现代论文形式，贺昌群以为应属《国粹

李弘祺：《泛论近代中国史学的发展与意义》，《读史的采趣》，第 213- 224 页。

说详罗志田《清季民初经学的边缘化与史学的走向中心》，《汉学研究》第 15 卷第 2 期，1997 年 12 月。

齐思和：《近百年中国史学的发展》，《燕京社会科学》第 2 卷，第 7 页。

学报》中的文章,可备一说。但当时不仅未能成为学人共遵的形式,且“论文”这一名称的使用也确立甚晚。抗父(樊少泉?)在1922年谈到王国维的《殷周制度论》时,仍说“其书虽寥寥二十叶,实近世经史二学上第一篇大文字”。可知当时尚未确立(或至少没有明确的)今日意义的学术“论文”概念,著作不论长短,大致仍以“书”名之。有关“论文”形式的确立及其发展沿革,仍待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讨论史学与社会的关系,最重要者或莫过于历史研究在当下的社会中起什么作用这一不能回避的问题(其实也已牵涉到史学的意义与价值何在这一更高远的问题)。今日史学研究者可能常常会遇到其他行业的人善意或不那么友善的问题:研究历史有什么用?但这同时也是一个持续不止百年的问题,19世纪后期身处西潮冲击之下的士人其实一直在思考包括史学在内的中国学术怎样“致用”这一大问题。

中国传统史学的一大功能是“资治”,历史研究可以提供小到个人生活大到国家政治得失的经验。但是这一功能至少在20世纪始终处于程度不同的怀疑之中,这一世纪的大到全人类小到中华民族的经历中有太多不令人乐观的现象,人们有理由要思考:要么史学本不具备“资治”的功能,要么本世纪的史学研究太让人失望,使政治未能得到“应有的”借鉴。

如果换个视角,至少在中国,在追随者或听众决定立说者地位的时代,史学是否具备这一功能或者是否成功地发挥了这样的社

贺昌群:《一个对比》,收入金自强、虞明英编《贺昌群史学论著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534页。

抗父:《最近二十年中国旧学之进步》,《东方杂志》第19卷第3号,1922年2月10日,第37页。

会作用其实主要看社会和社会中人对史学是否有这样的期望, 即是否往史学中寻找思想资源。如果政治人物和公众根本不关注历史学者的研究成果, 史学又怎么能提供得失的经验呢? 这个问题似乎有点循环论证的意味, 但如果史学确有类似“资治”的功用, 20 世纪中国史学的实际发展恰是一个恶性循环的典型例证: 当整个本土文化传统自身基本不再成为思想资源的时候, 与往昔关联最密切的史学自然地与“无用”(严复语) 联系起来, 人们当然也就不向史学寻找借鉴; 既然社会需求基本不存在, 史学是否能“资治”这一问题的解答在某种程度上其实已经前定, 研究成果的高下大致已是次要的问题; 这一倾向同时也会引导史家有意无意间不朝这一方向努力, 结果必然导致史学与社会的一步疏离。

有时候, 掌握权势的政治人物对历史的兴趣也可影响史学在社会上的地位, 但这与史学是否能“资治”似无直接的关系; 这一点只要制作一个政治人物对历史的兴趣与其政迹的对照表格就可以明白, 正式的结果当然要认真研究后才能得出, 我的初步感觉是研究者和读者也许都会发现史学具备“资治”功用这一观点在 20 世纪的政治经历中找不到有力的支持。今日治史者仍不乏怀有“资治”心态者(包括一些真的在“借古讽今”之人), 但已决非多数。不少史家实际是朝着“纯学术”的方向在努力, 另外更多以史学为业者恐怕根本就是为“吃饭”而已(这决无贬低的意思, 许多人以此为业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 原非其个人主动的选择; 甚至大学历史系本科招收“第一志愿”的学生也为数不多, 其间不少人后来以史学为业不过因为主要只受到这方面的训练, 从业较方便吧)。

那么史学究竟有没有用或有什么用? 这的确是一个较难回答的问题。近代中国许多提倡以历史激发爱国心的学人又同时主张学问不应问其有用无用, 如主张“以国粹激动种性”的章太炎便

又认为“学者在辨名实、知情伪，虽致用不足尚，虽无用不足卑”；一切皆“以实事求是。有用与否，固不暇计”。说明他们自己对此也存一种两可也两难的态度。应该说，作为人类知识的一部分，史学自有其存在的价值。若理论化一点，过去人们或说历史是人类社会的集体经验和记忆，没有历史的社会或族群，就像失去记忆的人，生活在没有时间因素的空间中，因而无法得到存在的意义。故一个社会或族群的存在实依赖于其历史的存在，而“历史”已逝去，需要史学来重建（重建出的历史是否真实客观又是另一层次的问题）。

今日比较纯粹的学者或者根本不考虑史学的当下功用，但知识是否应与社会互动呢？这或者可以视为一种“现代”的问题，因为后现代主义者根本认为学术研究不能异化于（因而不如直接参与）所处现实社会的权力运作。如果退而仅从史学的治学视角看，史家是否需要了解其所处的时代呢？孟子提出的“知人论世”史法似乎提示着肯定的回答。30多年前，史家沈刚伯就以《史学与世变》为题讨论了史学发展与时代的关系。在后现代主义冲击下的西方学界，史学家是否应主动介入“历史的制造”已成为每一个史家面临的困惑。今日海峡两岸的学人也都（因不同的语境）在思考和探索史学怎样为现实服务或史学如何从时代社会转变的刺激中寻找研究的新路径和新境界这类问题。杜正胜先生在1990年为《新史学》写的《发刊词》中已提出：“希望本刊出现的论文题目能扣住时代变动的脉搏。”到1998年他更认为，“如何接受外界不断的刺激以产生新观念、写作新史书，如何从时代社会的转变中寻找灵感以开展研究的新路径和新境界”是史学界不能不认真

章太炎：《与王鹤鸣书》，《章太炎全集》第4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51页。

思考的问题

当然,任何门类的“学术”的社会价值之一正在其与所处社会的距离感(以及实际的距离),史学如果走向社会甚至走入社会,怎样保持其相对的“学术独立”?怎样做到不随社会之波而逐社会之流?把握这一分寸恐怕是所有史学学人不得不深思熟虑的一个基本问题。后现代主义者以为学术本不独立,这原本是正确的。任何时代的学术从来不能逃避外在的影响,所谓的“象牙塔”根本只是理想而已。但如果大家提倡学术独立及倾向于独立,应能营造或促成实际的距离或距离感。有独立为目标,即使是感觉或认知上的独立(即距离感),也许仍能维持一定程度上学术的清流地位。除非彻底放弃任何程度的独立理想,主动介入的主张恐怕过高估计了学术及其载体学人的定力。一旦主动介入所谓权力运作程序,不但其互动的发展恐非学术所能控制,就是学术自身的发展也许会被扭曲到变形甚至不成形。无论如何,史学与世变的关系将会比过去更密切,大概也是下个世纪学术发展的必然倾向。

说到后现代主义对史学的冲击,最根本的还是其对历史知识可靠性的质疑,也就是一般所说的究竟有没有客观的历史学。在整个 20 世纪进程中,不仅史学研究的对象与研究方法在不断开拓转换,对历史研究本身的态度也有相当大的转变。由于自然科学的发展,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西方对“真理”的态度曾是非常乐观的。在此影响之下,盛行于西方的兰克史学的一个特征是乐观或英雄主义的,即认为研究者掌握了全部或完整的史料即可以客观地重建真实的历史。但这样的观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越来越受到挑战,物理学本身即有所谓“测不准”观念,提示了观察工具对观察的干

杜正胜:《发刊词》,《新史学》创刊号,1990年3月;《史语所过去、现在与未来》,第21页。

扰。既然科学主义标榜的客观性在科学内部已受到挑战,以科学主义为基本假设的实证史学自然不能逃脱冲击。

后现代主义者即认为,一切所谓的历史知识,不论其客观的存在性如何,当其被经由某种程序(而不是其他可能的程序)记录下来,又被史家有意识地加以选择组合之后,均只能是主观态度的产物。至于其存在的目的,不论有意无意,则为支持某种既存权威意识形态的工具。这些见解确实击中了实证史学的要害,后现代主义已经引起史家对历史材料的有效性和可信程度的进一步审视,并推动史家更加密切地注意研究者自身的价值观对研究的影响。今日史家所重视的早已不仅是材料的真伪和完整,而是要考察材料在何种情形下因何目的并经何途径怎样留存下来,以及这样留存下来的材料在多大程度上能使后人了解或认识到历史事物的“真实”发生发展过程。越来越多的史家已在反省研究者本身的生活经历、文化背景以及意识形态等对研究的影响。

今日史家对史学是否“客观”甚至历史的“真实”这一问题的观察和思考已远比本世纪开始时更为开放和多元化,“后学”冲击之后的21世纪史学可能意味着历史知识体系的重新组合,以及对历史知识的性质、意义甚至史学本身的价值进行重新评估。仍然存在的问题是,在后现代史家把史学的相对性揭露无遗以后,他们是否

参见许倬云《社会科学观点的转变与科际整合》,“迈向新学术之路:学术史与方法学的省思”研讨会论文。

由于我对后现代主义完全外行,这里的讨论参考了1998年10月在台北中研院史语所召开的“迈向新学术之路:学术史与方法学的省思”研讨会上蒲慕州先生《生活史研究与人类学》一文的结论部分(第14-16页)和黄进兴先生关于“后现代主义与历史研究”的发言。黄先生就此题目撰写的专书不久即将出版,可以参看。我个人的一点浅见可参阅罗志田《后现代主义与中国研究:怀柔远人的史学启示》,《历史研究》1999年第1期。

要重建历史？如果答案是肯定的，他们将重建出什么样的历史？如果是否定的，他们怎样进行研究？怎样表述经其研究过的“历史”？

中国史家傅斯年在二战后不久论学术的客观性说：若推到极端，不论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都只是“理想的境界”。我们“想以客观为理想而去努力，尚且弄得不客观，一旦完全把客观放弃，认为是不可能的、不需要的”，甚或“以为一切社会的方法都是从某一主观的法规，这对于社会科学之进步当然是一个大障碍”。“进步”可能又是个“现代”的概念，不过，当孔子提出“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时候，他也许已经体会到人类认识能力及实践能力的相对和有限，但“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态度可能仍是接近真理（如果确实存在的话）的惟一途径。

〔作者罗志田，1952年生，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清华大学历史系兼职教授。成都 610064〕

【责任编辑：曾学白】